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一辑)

#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主 编 任茂棠 副主编 赵瑞民

侯欣珪 著



北宋名臣司马光为资帝王之治，精心编撰了《资治通鉴》，此书上启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历时二千余年。按年纪事。创造编年体史书之例，成万古不朽之作。读过此书，可初步领略司马光惊人的智慧和精湛的历史见识。

山西古籍出版社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侯欣桂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80598-346-1

K·114 定价:2.40 元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 1 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  
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
- 2 佛教圣地五台山
- 3 话说云冈石窟
- 4 洪洞大槐树寻根
- 5 山西书院史话
- 6 三晋戏曲漫话
- 7 北魏政治女杰冯太后
- 8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 9 朱总司令在太行
- 10 高君宇的革命生涯

## 目 录

引子 .....	(1)
良好的家庭教育 .....	(1)
7岁破缸救人,名震京洛 .....	(3)
20岁高中进士甲科 .....	(5)
居丧3年,关心民瘼 .....	(6)
并州居官,留意边防 .....	(7)
知谏院5年,政绩卓著 .....	(11)
成功调解两宫矛盾 .....	(14)
为民请命 .....	(15)
改革之争,惊心动魄 .....	(18)
五辞枢密使 .....	(20)
废除新法 .....	(21)
从《通志》到《资治通鉴》 .....	(23)
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	(29)
结束语 .....	(32)

## 引 子

鲁迅先生曾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司马光离开人世已近千年了，离我们已是那样的遥远。他的灵魂也已灰飞烟灭，他的肉体也早已化为尘埃。但我们活在现在的人，还没有忘记他，还在纪念他。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他宝贵的有意义的人生事迹，尤其是他用心血凝结成的不朽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 良好的家庭教育

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享年68岁。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安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墩里(今水头乡小晁村)。隋唐五代以后家族政治地位日渐下降。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伯祖父司马炳都以布衣而终。北宋初年，家世又有所转机，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政绩显著，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时，曾



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官居四品,为人清直仁厚,号称一代名臣。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司马光的叔父司马沂和司马浩为掌管这个大家庭而宁愿牺牲前程。司马沂自勉自励,辛苦经营,司马浩慷慨仗义,抚恤孤寡。司马光的先辈和他们这一辈,多是好学上进,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这一辈,有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更是一个有抱负、有见地的人。他少年时胸怀大志,专心读书,力求进取,而且治学态度十分扎实认真,文风质朴。在待人处事、理政、治家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也都贯彻了这种精神。司马池考中进士,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办事明快干练,而且为人正直,不谋私利。从郟(音 pi)县县尉,到光山县令、群牧判官,都因他贤名远扬而被人举荐。司马池为人端正,不畏权势宋仁宗时,朝廷提升他为谏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但司马池不为所动,恳切辞让不就。宋仁宗感动地说:“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

司马池在宋朝那样官场风气十分奢侈、腐败的氛围中,不仅为官清廉,待人诚挚,而且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读书,认真做官,凡事多从百姓利益着想,在封建社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官。司马光的母亲姓聂,也是一个德才俱佳的女子。

家庭教育对司马光的一生影响极大。他的祖辈,尤其是他的父亲,对司马光的品行和为人处事,以至于远大抱负的形成,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7岁破缸救人，名震京洛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父亲正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任县令，司马光就出生于光州光山县官舍，所以其父给他起名光。

司马光出生前，已有两个哥，二哥司马望夭亡，大哥司马旦，比司马光大13岁。司马池很注意对司马光的教育和培养，6岁时，就教司马光读书。司马光天资聪慧，读书又十分认真刻苦，他读《左氏春秋》，爱不释手，7岁时，对《左氏春秋》不仅能流利地背诵，而且能讲明白书的要意。

一次，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在司马家做客，听说司马光聪明过人，便有意一试，就让司马光背诵《左传》中的《周郑交质》一文，并要他评述文中要义。此文内容是描述春秋时周、郑二国为了结好相互向对方送人质的情况，寓意很深。司马光不仅背诵得流利畅通，一字不差，而且还评论说：“两国交往以信义为本，信义若不是发自内心，就是交换了人质也不起作用。如果明恕以礼，就是没有人质，也是谁也不能离间两国关系的。”范仲淹听了之后，赞叹不已。

司马池抓住一切机会对儿子进行教育。一次家乡送来一些青核桃，司马光以为是梨子。结果一尝又苦又涩，姐姐告诉他这是青核桃，皮子不能吃，需要把皮剥掉，但又不知如何剥掉。姐姐离开以后，一个奴仆把青核桃放在热水中烫了一下，核桃皮就剥下来了。一会儿姐姐回来问他是谁把核桃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下来的。父亲司马池知道这

件事后，对司马光训斥道：“小子何德谩（音 mán，欺骗）语！”教育他从小事做起，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从此，司马光时时反省自责，立志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并作自勉诗一首，强调“诚实为根本，立德应在前”，而且自取字为君实。

司马光在7岁时，曾做出一件震动京洛的事：一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放着一口大缸，里面存满了水。有一个小伙伴攀上了缸沿，一不小心掉进了缸里，其他孩子一看不好，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没有跑，而且搬起一块大石头向缸猛砸，缸破了，水流出来了，小伙伴得救了。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汴京（今开封）、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这件事说明幼小的司马光临危不惊，机智勇敢，遇事爱动脑子，千古传为佳话。

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表现了司马光的胆量和勇气。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一生俭朴的生活习惯也给司马光很大影响。司马池一生不喜欢金银美服，也不喜欢华贵的打扮。因他在考中进士以后，皇帝举行喜宴，大家都戴上宫花，而唯独他不戴，还是一个同年告诉他，这是皇帝所赐，他不得已戴上了。他一生对财利视之为“如恶恶臭”。当他身居高位以后，他依旧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到晚年，他又将此美德教导儿孙，作《训俭示



康》一篇专文，让子孙永远保持此优良传统。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15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这些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在司马光的成长中起了很大作用。

## 20岁高中进士甲科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石虽比司马光大20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也在这一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了婚，虽属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但夫妻感情很好，妻子在家操持家务，教养子女，给予司马光很大支持。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3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音hào)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有害,因为战争发生在西北边境,而远在万里之遥的东南海滨设置乡兵对缓解紧张局势毫无补益,而且可能造成地方混乱。奏章的核心是从实际出发,以不增加人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为原则的。不幸的是这个奏章给他父亲带来了麻烦,一生正直正派的司马池,第二年就被调往偏僻的虢州(音guó,今河南陕县东南)。

### 居丧3年,关心民瘼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

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也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许多

有真知灼见的见解。在《四豪论》中，他对人们历来所公认的战国四公子，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孟尝君虽养士施恩，却不顾法度，结私党、立私名，以窃相位；春申君虽有保全楚国安危之功，但依仗权势，穷奢极欲，把楚国搞得衰弱不堪；平原君因贪利而导致战乱，几乎使赵国灭亡；信陵君能忠心为国，不仅保全了魏国，而且安定了六国。所以，他给四公子排名：以信陵为首，平原次之，孟尝又次之，春申为其下矣。

在居丧3年的时间里，闲散的乡居生活，使他有机会与邻里亲友交往，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县尉孟翱和司马光有同年之交，孟翱是个有责任感的清官，他强记博识，又十分尽心职守，对县境之内的山川河流，道路村落都了如指掌；全县吏卒、百姓、穷富、仓廩等情况，他也一清二楚。司马光对这个身居父母官的同年十分佩服，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他们对宋朝和西夏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深表同情，对国家因腐败给百姓造成的痛苦，表示极大愤慨。

## 并州居官，留意边防

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26岁的司马光结束了居丧闲散的生活，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司马光从小爱读史书，长大成人后，由于年龄、阅

历的增长和知识领域拓宽,更对史书有了特殊的爱好。这些历史论文,无疑都为他编著《资治通鉴》打下了基础。

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29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发誓要推翻宋王朝。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出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惨遭杀害,其余尽皆焚死。

从此,庞籍越来越受到仁宗赵祯的信任。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升任枢密使。庞籍对司马光非常器重,遂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两年后,庞籍当了宰相。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33岁,由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的,既很荣耀,对爱好历史研究的司马光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

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

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仕途得意的时候，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音 yún，在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希望身边有个得力的助手，因此，便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从郓州赴并州时，山路崎岖难行，司马光曾写诗记述当时情景：“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为通人行。”“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并州属于苦寒的地方，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描写：“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得知非虚名。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复能精明。跨鞍揽辔趋上府，发举须磔指欲零。”意思是说并州地方景象凄惨，烟雾遮天，天气寒冷，冻得人头发直立，胡须折断，手指几乎掉下来。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使司马光消沉，虽然“年垂四十”，仍然“晨夕思乾坤”。为了实现平生之志，他没有自暴自弃，不仅尽心地方政务，而且依旧关心国家大事。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仁宗皇帝已经47岁，没有儿子，还一直未立太子，加之仁宗又得了病，满朝文武为继嗣而着急，司马光虽远在边地，当他得知这一情况时，认为皇储对稳定国家极为重要，因此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而前后三状“皆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者”。以后他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

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也只好沉默了。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为了保护边界地区安宁，当时提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司马光认为可取，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没有牵连司马光。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也回到了京师。但司马光觉得庞籍本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出了事庞籍却极力回护他，并为此加重了罪过，心中十分不安，决心向皇帝奏明此事。为此他连奏三状，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对庞籍夫人像生母一样对待，对他的儿子们像亲兄弟一样亲，充分显示了他们二人的高尚品德，当时传为佳话。

## 知谏院 5 年，政绩卓著

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对于这个职务，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不是嫌官小，而是认为这个职务需要“文采”，而自己“实非所长”。所以，虽属荣升，但也不愿意去从事自己所不擅长的事情。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司马光也就勉强赴任了。

不过时间不长，仁宗又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这个职务，主要是“掌规谏讽谕。凡朝政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即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其实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所谓“为谏臣有言责，世人自见疏”，别人不愿当，而司马光欣然就任，毫不推托。司马光一向是有见地、有抱负，希望有所作为。但因位低身微，而不能得到施展，为此他曾经苦恼过。现在擢升为谏官，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谏，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事，他认为这是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所以，他非常高兴。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恪尽职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个任上 5 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 170 余份，为大宋江山的稳固，尽忠保国，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

司马光在担任知谏院以后，他抓住封建国家盛衰的三要素，即人君、官吏、军队，分为“陈三德”、“言御臣”、“言拣兵”三个札子进上。在“陈三德”的札子中，讲明了人君治国的理论和原则；在“言御臣”札子里，他直率地指出朝廷用人

之失是不择其贤遇，不问其能否，一味论资排辈；“言练兵”主要是针对军队需要整顿，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废兴之端，安危之要，尽在于是。”而宋朝的军队是多而不精，羸弱充数。在奏折中对治国三要素，不仅提出了问题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在提出“三德”、“御臣”、“练兵”以后，他认为对人君修身治国之道谈得还不够全面细致，于是他进“五规”状加以补充。所谓“五规”，一是“保业”。主要简述江山“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的道理。他用自周秦至宋 1700 多年的分合治乱、改朝换代的历史，提醒皇帝“援古而鉴今”，兢兢业业地保守祖宗的基业。二是“惜时”。启发皇帝“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图一时的安逸与私欲而堕落。三是“远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要有“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的远见，不要等待战乱已起，灾祸已至，才临时抱佛脚，那就来不及了。四是“重微”就是要防微杜渐，做到“销恶于未萌，弥祸于未形”，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明君。五是“务实”。要求皇帝“拨去浮文，悉敦本实”，治理国家一定要讲求实际，要“先实而后文”，要做出成绩，然后才形之于文，一件事不要还没开始，先大肆吹嘘，名实不符。

“三言”、“五规”，是治理国家至关重要的理论，也是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总结历代君王安邦治国的经验总结，是“守邦之要道，当世之急务”。司马光勇敢地进谏，希望宋朝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出现中兴的太平盛世！

司马光在知谏院任上，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皇帝继



嗣问题，曾多次上疏没有解决，现在身任谏官，就更责无旁贷了。他刚进谏院就面见仁宗皇帝，开门见山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仁宗当时不知所措，呆了一会，才想起是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皇帝高兴地对司马光说：“此忠臣之言，别人不敢说，而你竟连上三章。”以后司马光又上疏催促，仁宗觉得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很是感动，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趁热打铁，又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司马光忠于职守，在知谏院他抓住难得的机遇，短短几个月上疏“三言”、“五规”，又紧锣密鼓解决了皇帝继嗣问题，他直言敢谏，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司马光 44 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 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按说知制诰之职，是个极荣耀的职务，随侍皇帝左右，既可以显露才华，又可以飞黄腾达，随时可以得到重用，但司马光不愿意就职。其理由主要是，他认为自己不擅长文词，不适宜任此职务；另外，他反对因循用人的积弊，凡做知制诰必先任修起居注，再任知制诰，自己奏牍在先，不愿自食其言。司马光以极其诚恳坚决的态度，请求不任知制诰，仁宗皇帝终于收回成命，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